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政策(上)

魏后凯 刘 楷

当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东西差距的扩大,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九五”计划和第二个十年规划期间,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把地区差距扩大的幅度控制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并促使其朝着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从而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地带差异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但是,如果把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三大地带的经济实力虽然都有较大提高和发展,但从提高和发展的程度看,中、西部地区没能和沿海同步发展,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三大地带经济增长日趋不平衡

进入80年代以来,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不但持续落后于东部地区,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和东部相比,二者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如果我们东、中、西三大地带不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行计算,然后把各个时期内中、西部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同东部相应增长速度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9年—1980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东部地区。80年代全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国家投资分配和政策投入向沿海地区倾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东部地区。1981—1988年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各为10.83%和10.88%,分别只有同期东部年均增长率11.80%的92%和91%。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三大地带经济增长速度均大幅度下降,其中以中部下降最甚,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48%,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反,西部的增长速度为6.11%,略高于东部地区。1992年,随着治理整顿的结束,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又开始大幅度地超前于中、西部,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各为11.58%和9.23%,分别只有同期东部年增长率(18.37%)的63%和50%。中、西部发展速度同东部发展速度之差距,与80年代相比,又进一步扩大。

表1 三大地带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较

单位: %

		1979-1980	1981-1988	1989-1991	1992
东部	年均增长率	4.64	11.80	5.76	18.37
	相对增长率	1.00	1.00	1.00	1.00
中部	年均增长率	5.53	10.83	3.48	11.58
	相对增长率	1.19	0.92	0.60	0.63
西部	年均增长率	5.00	10.77	6.11	9.23
	相对增长率	1.08	0.91	1.06	0.50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和《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2、1993)所提供数据整理而成。

2. 全国生产力分布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

由于80年代中、西部与东部的增长速度差距在不断扩大,使中、西部各自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的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表2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除1978—1980年略有上升外,基本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中部9省区下降最甚,由1980年的31.3%下降到1992年的27.95%,降幅达3.36个百分点;西部9省区次之,由16.52%下降到15.50%,降幅为1.02个百分点。而同期东部12省区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则由1980年的52.17%,上升到

1992年的56.55%，上升幅度为4.38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活动在不断向东部地区集中。

表2 三大地带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东	中	西
1978年	52.50	31.00	16.51
1980年	52.17	31.31	16.52
1986年	53.11	30.90	16.00
1989年	54.43	29.83	15.73
1991年	54.90	28.79	16.31
1992年	56.55	27.95	15.50

资料来源：同表1。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3. 三大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

如果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做为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做为衡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变动方向的强度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三大地带各自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成倍增长，但中、西部同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急剧扩大(见表3)。首先，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同东部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的差距除1979年—1980年略有缩小外，基本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81—1992年12年中，中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由31.2%扩大到43.1%，扩幅达11.9个百分点；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由43.8%扩大到50.5%，扩幅达6.7个百分点。特别是在1992年，中、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3.6和4.2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中、西部同东部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急剧扩大。其次，相比较而言，中、东部间差距扩大的速度要快于西、东部间差距扩大的速度。如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中、东部间差距也将达50%以上，并将超过西、东部间差距。第三，1981—1992年，虽然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大幅度(6.7个百分点)小于中部同东部的扩大幅度(11.9个百分点)但由于西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1992年西部同东部的差距已达50.5%，仍大于中部同东部的差距43.8%，西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不及东部的一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表3 三大地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差距变动情况

		1978年	1980年	1986年	1989年	1991年	1992年	差距变动		
								1979—80	1981—92	1992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人)	东	45.74	488.3	860.7	1098.7	1192.6	1398.9			
	中	310.3	3336.0	579.6	696.9	721.6	796.3			
	西	254	274.3	463.2	568.0	640.9	692.0			
相对差距(%)	中部同东部	32.2	31.2	32.7	36.6	39.5	43.1	-1.0	+11.9	+3.6
	西部同东部	44.5	43.8	46.2	48.3	46.3	50.5	-0.7	+6.7	+4.2

资料来源：同表1。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二、三大地带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东部沿海同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差距逐年扩大，固然有其历史和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认为东、西部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巨大反差是造成我国东、西部差距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

1. 资金投入上的差异

(1) 国家资金投入向沿海倾斜，减缓了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配看，1981年，东、中、西三大地带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5.91%、27.98%和17.49%，而到1992年则分别变为54.57%、24.64%和15.49%。12年间，东部上升了8.66个百分点，中、西部则分别下降了3.44和2.00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的重点在不断向东部地区转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1991年,国有单位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中部为68.56%,西部为73.29%,其中一些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省区,如黑龙江、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则分别高达85.69%、81.10%、81.83%、89.77%和80.23%;而东部这一比重则只有60.31%,其中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省如江苏、浙江和山东则分别只有37.92%、29.75%和53.22%。这说明,对于中、西部,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资源省区来说,与东部相比,其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国家资金的投入。因此,国家资金投入东移,势必对中、西部那些长期依靠国家资金投入的省区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 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沿海,中西部受惠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人文因素和国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金上占据了绝对优势。1990—1992年,我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257.94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各省区实际利用外资达227.92亿美元,占全国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8.36%,而中、西部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仅有17.42亿美元和7.61亿美元,分别只占全国各省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75%和2.95%。显然,沿海地区大量的引进外资对缓解建设资金的不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1992年为例,东部共利用外资120.1亿美元,按当年国家公布牌价的汇率计算,约为660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东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4%,如按外汇调剂价计算,这一比率则高达20%以上,而同期中、西部引进外资则只分别相当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和1.35%。因此,可以认为,中、西部基本上没能从引进外资中获得对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3) 中、西部资金大量外流,严重削弱了当地经济发展。近年来,在沿海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西部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存贷差、横向投资和股票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向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和开放港口城市。中、西部资金大量流向沿海,无疑使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更趋严重。

(4) 西部实际积累率低,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沿海地区的自积累能力不断增强。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1年,沿海地区实际积累率由36.7%提高到37.2%,中部地区则由33%下降到30.9%,西部地区则由34%下降到29.6%。很明显,中、西部实际积累率的下降是近年来国家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结果,反过来,这又将进一步影响中、西部未来的经济增长。

2. 所有制结构上的差异

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沿海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使沿海地区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国有企业经济迅速发展,并已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反,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进度较慢,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这恰好与沿海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见表4)。值得一提的是,在沿海非国有企业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迅猛发展,到1991年,沿海乡镇企业已发展到6664.96万家,占全国乡镇企业总数的34.9%;企业总产值7632亿元,占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5.7%,占沿海地区社会总产值的29.5%^①,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撑沿海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4 三大地带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东	中	西	东部的苏、浙、闽、鲁、粤
1981年	29.79	22.50	15.09	40.51
1989年	56.26	41.83	31.84	66.67
1992年	59.64	38.90	33.29	68.36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和《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提供数据整理而成。

3. 经济发展战略导向上的差异。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证明,以发展出口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促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内向型经济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利用其处于国际、国内两大市场过渡地带特别是濒临港澳这一优越地理位置,通过不断引进资金、技术,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贸易有了迅速发展。如果以出口依赖度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外向性的指标,1991年沿海地区的出口依赖度为22.08%,其中广东已达到42.28%,基本上接近同期台湾42.37%的水平。经济外向性的不断提高,对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海岸线,又缺乏国家必要的优惠政策,因此,在吸引外资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均受到很大限制。整个80年代,中、西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往往是以其自身有的

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价格优势作为基础,以提高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为目标。其结果,1991年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依赖度分别只有7.44%和5.72%,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因此,可以认为,中、西部和东部在发展战略上的不同取向,也是造成东、西差距日益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产业结构上的差异

在我国国民经济地域分工中,中、西部地区一直被当作东部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尽管国家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在中、西部兴建了许多大中型企业,但除了三线军工企业外,余下的企业大多属于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其加工部分一般被甩在区外,中、西部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商品优势。80年代以来,虽然中、西部许多省区都曾致力于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以图改善产业结构,但其效果并不明显(见表5)。

直到1989年,中、西部的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仍分别高达55.70%和59.83%,高于全国51.16%及东部47.04%的水平。在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合计所占的比重,中、西部分别为48.91%和42.93%,一些内陆资源边境省区(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则高达60.26%,远远高于东部40.99%的水平。这说明,目前在中、西部的工业发展中,增值程度较低的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在加工工业的发展中,中、西部的加工层次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表5 1981-1989年三大地带工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 %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在重工业产值中					
			采掘工业		原料工业		加工工业	
	1981年	1989年	1981年	1989年	1981年	1989年	1981年	1989年
全 国	49.13	51.16						
东 部	45.91	47.04	8.73	5.69	43.76	35.30	47.50	60.91
中 部	54.12	55.70	25.68	16.57	35.07	33.34	39.25	49.83
西 部	52.66	59.83	17.87	11.25	39.25	31.68	42.73	57.10
晋、蒙、贵、云 甘、宁、新 资源边境省			28.94	21.65	40.60	38.61	30.46	39.73

注:本表中所计算的数字不包括广东、青海、西藏。

资料来源:同表3。

三大地带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这种差异,一方面使中、西部丧失大量的产品附加价值,使之流向东部沿海,另一方面由于加工层次低,主导产业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比较松散,难以形成中心城市向周围农村地区扩散的生产要素传递网络,使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的农村地区,至今仍处于待开发状态,从而降低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5.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

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经济基础较差,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其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一般要低于东部地区。特别是近年来东部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工业经济效益提高较快,这无疑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工业企业之间的经济效益上已有的差距。首先,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1992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4338元/人·年(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东部12省区除河北(28267元/人·年)、辽宁(28869元/人·年)外,其它10省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均在4.5万元/人·年以上,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中、西部地区,除云南(36384元/人·年)略高于全国水平;湖北(30721元/人·年)略高于3万元/人·年以外,其余16省区均在3万元/人·年以下,同东部的差距十分明显。另据我们的测算表明,在“七五”期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45.2%,其中东部提高了51.5%,而中、西部只分别提高35.2%和37.8%。其结果,中部与东部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异由1985年的29.9%扩大到1990年的37.3%,西部与东部间的相对差异则由29%扩大到35.2%。其次,在资金利润率方面,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也十分明显。1992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税率为9.89%,东部为10.63%,中、西部分别为8.44%和9.79%,低于全国和东部的水平。以上两方面的差距说明,即使在劳动力、资金投入相同的情况下,东部也将会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6. 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产业结构分析及预测(上)

胡少维 ●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方面须靠深化改革,建立合理的企业经营机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就是需要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当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农业生产薄弱;尤其是基础结构的发展滞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能源、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增长缓慢,技术落后,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近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调整产业结构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从生产规模、劳动就业、固定资产等方面可以观察到产业构成比例的变化。由这些构成比例表示的产业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会逐步上升。长期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紧密相联。

表1,是用100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到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表1 人均GNP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亿元

指 标	人均GNP							
	100 美元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600 美元	1000 美元	2000 美元	3000 美元
储蓄总额/国民生产总值	12.0	14.8	16.4	17.6	19.3	20.5	21.5	24.6
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占的比率	46.4	36.0	30.4	26.7	21.8	18.6	16.3	9.8
第二产业在生产总值中占的比率	13.5	19.6	23.1	25.5	29.0	31.4	33.2	38.9
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占的比率	68.1	58.7	49.9	43.6	34.8	28.6	23.7	8.3
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占的比率	9.6	16.6	20.5	23.4	27.6	30.7	33.2	40.1

(上接第8页)从主观上看,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思想比较解放,胆子较大,能够较快地接受现代商品经济的新思想、新观念,较好地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及时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用足、用活中央给予的各项政策,并在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一些超前性的试验。特别是,在发展和培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市的领导人思想开放,敢于率先把一些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市、县地方政府和企业,敢于率先把企业推向市场。地方政府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企业服务上,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则让企业自己大胆去解决,政府为企业铺路、搭桥,通过市场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是内地一些省、区所不及的。

注^①:引自王彩明、冯广军《我国乡镇企业的成就、经验、前景》,《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7期第28页。

(未完待续)